

敦化文史资料

第二辑

敦化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目 录

敦化历史概况·····	刘忠义	(1)
二旅开辟敦化的回忆·····	朱国栋	(12)
在敦化建立根据地的回忆·····	卢 森	(27)
在“九、一八”的日子里·····	范广明	(35)
日本宪兵队在大山的 罪行·····	赵德信口述 鞠胤忠整理	(40)
李寿山与敦化烟馆·····	李盛芳	(45)
陈仲武轶事·····	姜德璋 鞠胤忠	(56)
杨振邦遇害经过·····	邵本仁 鞠胤忠	(69)
姜德镛被捕前后·····	姜德璋 于春海	(73)
商会会长万茂森·····	姜德璋 于春海	(77)
回兴武教长二、三事·····	姜德璋 韩再环	(83)
大蒲柴河保安游击大 队第一中队叛变始末·····	市委党史办	(87)
维新区中队叛变经过·····	市委党史办	(93)
忆敖东中学·····	姜德璋	(99)
编后·····	文史委员会	(103)

敦化历史概况

刘 忠 义

敦化市位于吉林省东部，在北纬42度42分至44度30分、东经127度28分至129度13分之间。东西长142公里，南北长200公里，面积为11900平方公里。除市街外下设8个镇12个乡。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辖市之一。

敦化市地处山区，境内高山耸立，河道纵横，土质肥沃，物产丰富。西有张广才岭支脉，南为黄泥岭。因群山环抱，为高寒山区气候，无霜期短。

敦化境内河流分布为两大流域。一是牡丹江流域，以牡丹江为主，它发源于敦化市南部牡丹岭北麓，折曲向北，汇集了大小近百条河流。主要支流有大石河、小石河、黄泥河、沙河、威虎河、珠尔多河、马鹿沟河、都陵河、官地河、塔拉河等，其流域占境内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二是富尔河流域，以富尔河为主。它发源于敦化市西南部富尔岭东麓，它汇集了八道河、浪柴河、仁义河、杨树河、柳树河、小蒲柴河、大蒲柴河、镜沟河、凤凰沟河、石人沟河等支流，注入松花江，成为松花江主要源流之一。

敦化市周围，与许多县份毗邻。西邻桦甸、蛟河；北邻五常、尚志、宁安；东邻汪清、龙井、安图；南邻抚松。长图铁路在敦化境内横贯东西，公路四通八达。在军事上，自古以来堪称要冲。敦化地方，有着悠久沧桑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远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代，这里就居住着我国东北最古

老的民族之一肃慎族。肃慎是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东北古代民族之一。先秦时期编撰的《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左传》、《国语》、《山海经》和两汉时著的《史记》、《淮南子》等文献都有关于肃慎的记述。《竹书纪年》中记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自慎氏来朝，贡弓矢”。“息慎”即“肃慎”。《国语》记载：“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镞，其长尺有咫”。《山海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晋书·四夷传》：“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

以上文献，记述了肃慎的地理位置及其同中原关系。王承礼《渤海简史》论述说：“肃慎分布在今长白山以北，松花江中上游和牡丹流域的广大地区，牡丹江流域有可能是肃慎人活动的中心”。敦化地处牡丹江上游，正置不咸山之北，属肃慎活动区域。西周的中原已是青铜鼎盛时代，然肃慎族文化，较中原落后，尚停留在石器时代，过着原始生活。敦化境内的十余处原始遗迹，从一个侧面描绘了肃慎人的社会生活。代表这个时期的大山嘴子居住址，选建在适于渔猎农耕并举的依山傍水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有反映农业生产的石斧、石磨盘，也有渔业生产所用的陶网坠等。厚15厘米的文化堆积层，杂夹的大量陶器残片，则说明肃慎人的某一部族曾经在大山居住了很长时间。

官地镇柳木桥石棺墓及黑石乡金沟古墓群，营造在山南麓，均用石块垒砌成南北向的长方形石棺。墓中随葬有死者生前使用的石斧、石刀、石凿、石短剑以及桥状耳陶钵。

在敦化的官地、大蒲柴河等原始遗址中，出现过以石头磨

制成的锋利箭头，即文献中所载的：括矢石弩。这同黑龙江省境内牡丹江中游的原始社会遗存地域相临，反映的原始社会文化面貌也极为相近。“括矢石弩”不仅流行于东北，就是在中原也享有盛名，颇受兵家欢迎。在敦化各地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遗物，大致反映出牡丹江上游原始文化面貌。这里出土的板状石斧，凹背弧刃石刀、方柱体石凿等，在图们江流域原始文化中比较少见，而与吉林地区西团山文化中的某些遗存相近。金沟古墓中出土的桥状双耳陶钵，是第二松花江中游常见的一种形制，长白山东南侧的原始文化中，很少有这种遗存。

到汉代，称肃慎为挹娄，到南北朝时又称为勿吉。这段时间里，一直与中原保持着隶属关系。本世纪三十年代，在敖东城遗址东半部修建制材厂时，出土过南北朝时代北齐的货币“天保通宝”。前几年，在敖东城北半公里左右的地方，又出土了一颗北齐的官印“前将军印章”。这都是难得的实物依据。

到隋唐时代，把勿吉称为靺鞨。人当时分许多部族，分别居住在不同地域。如住在长白山一带的称为白山部；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称为黑水部；居住在松花江中上游的称粟末部。因当时松花江叫粟末水，所以把住在粟末水一带的靺鞨人，称为粟末靺鞨部。

就是这支粟末靺鞨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较之靺鞨其他各部实力雄厚。公元七世纪，他们的主力从松花江流域移居牡丹江中上游。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粟末靺鞨部的首领大祚荣，在长白山东北的东牟山，筑城白川，作为根据地，建都称王，号震国。《旧唐书》：“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

用兵，韩蕲之众及高丽余退，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桂娄为“挹娄”之误。《新唐书》（祚荣）“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特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据考证，敦化西南的城山子山城，即是当年的东牟山城。

公元713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始称渤海国，成为东北较大的地方政权。《旧唐书》：“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析之误）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新唐书》“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韩蕲号，专称渤海”。旅顺黄金山下曾出土了唐代崔忻的井栏题名石刻：“敕持节宣劳韩蕲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是崔忻完成册封使命后，返回长安途径旅顺口时，掘了两口井，留作纪念的。石刻中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的记述，可证实册封之年当为开元元年，即《旧唐书》所谓的“先天二年”。近三十多年来的考古调查证明，敦化的敖东城遗址，就是渤海王朝的开国都城，即崔忻册封大祚荣之所在，按《唐书》的记载当时称“忽汗城”，敦化一带属忽汗州辖区。

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年）渤海第三代国王大钦茂，向北迁都到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仍称忽汗城，从这时起，就将原都城称为“旧国”了。

因敦化是渤海王朝的开国所在，所以境内现存渤海遗迹中的十一处遗址、一处墓葬、一处墓群、十一处城址、五处建筑址等，有许多是研究渤海初期社会历史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渤海城址，从分布和规划布局上可以分为两期。唐玄宗天宝末年，渤海政权以敖东城迁都上京以前为初期，其后为中晚期。敦化境内除敖东城、城山子山城外，还有马圈子古城、横道河子古城、大甸子古城、石湖古城、通沟岭山城等。这些初期城址，规模较小，如敖东城的外城，只有 400×200 米；而中晚期的八连城（渤海东京）外城周长为2894米，上京龙泉府外城周长约35华里。初期城址的规划布局也不统一，城的设置和城内建筑更无统一规划；中晚期城址的修建，由于受到隋唐长安城格式的影响，所以规划整齐，布局得体，街坊井然有序。从敦化境内山城址，还可以看出初期城址的另一个特点是山城与平原城的结合，敖东城和城山子山城为一个区域，黑石古城、石湖古城和通沟岭山城为一区域，马圈子古城则又为一个区域。到了中晚期，上述情况就很少见了。上述城址遗迹反映了渤海政权中心在敦化时，各种制度还没有完备的历史状况。六顶山古墓群是研究渤海的标尺。墓群可分为第一墓区和第二墓区。据初步认定，一区有墓葬30余座，二区有墓葬50余座。1949年至1964年间，有关单位相继在二区内作过一些清理发掘工作，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两个墓区的墓葬类型及其特征。

从外观上看，一区墓葬封土较高，二区墓葬的封土较为低平。清理发掘后的情况也表明两个墓区的墓葬形制有所不同。二区中小型石室或石棺墓较多，缺乏一区较大型的石室墓；一区不见二区所存在的土坑墓。六顶山发掘墓中的十一座火葬墓皆在第二区。有人认为产生二区差别的原因是埋葬者的地位与身份不同，一区是以王室贵族为主，二区则以一般官员和平民为多。也有的同志认为一区的时间略早，二区的时间稍晚。二次葬和多人合葬普遍存在于六顶山整个墓群，而墓葬中发现的人骨

与兽骨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尚未见于其他渤海墓葬。另外、无论在大型墓上或是中小型墓上，都发现了有铺盖瓦砾的痕迹，从而说明渤海前期普遍继承了“冢上作屋”这种文献记载的勿吉埋葬习俗。到了中晚期，这种现象就只存在于大型墓葬上了。渤海中后期的砖室墓在六顶山墓群中是不见的。与六顶山墓群一道山梁之隔的六顶山瓮棺墓，为研究渤海早期的埋葬习俗，增添了新的内容。

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建筑特色的渤海“二十四块石”遗迹，在敦化境内分布最多，发现的时间也最早。对这种建筑遗迹的用途，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有渤海王室纪念性建筑物说，停灵说，驿站说，仓廩说。近年，朝鲜的咸镜北道，吉林省图们市均发现同类遗迹，为进一步研讨“二十四块石”的用途，提供了新资料。

在上述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文物。位于六顶山墓群一区中部的贞惠公主墓中，出土的石碑说明六顶山墓群是渤海王室贵族茔地，为敦化敦东城是渤海国初期都城提供了佐证，并且为渤海使用汉字等提供了确凿证据。墓中出土的一对石狮，其造型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可见渤海初期受唐文化影响之一斑。六顶山古墓群出土双唇深腹陶罐，是靺鞨所固有的文化因素之一，而墓区出土的乳丁纹瓦当，网格纹板瓦等，又与集安等地出土的高句丽文物相近。靺鞨族文化，与唐文化相融，并且渗透着高句丽文化因素，构成了敦化境内渤海初期文化的特点。从而引起中外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

公元926年（后唐天成元年），契丹起兵灭渤海后，建立了辽国，敦化一带属东京道白山部所辖。公元十二世纪初，女真人兴起，建立了金国，在松花江中游定都上京会宁府（今黑

龙江省阿城），敦化一带属上京会宁府辖区。敦化现存辽金时期遗迹较多，尤以居住址最多。另外，也发现了山城和墓葬。

这一时期的遗迹在敦化南部的富尔河流域较为集中。在牡丹江两岸附近也有分布，其中有些遗址是建立于渤海时期居住址之上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有：六耳铜鼎、铜镜、铁矛、铁钎、铁斧、铁制马具、铁镢、铁菜刀、铁锤、铁钉、铁铤、铁铎以及陶器残片、板瓦等。种类繁多的铁制农具，表明这个时期农业发展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钱币，有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通宝”，有南唐的“唐国通宝”，还有辽代的“大康通宝”，但更多的是宋代颁发的“宗元通宝”、“崇宁重宝”等。可见，辽金时期货币的流通状况，是以宋钱为主。

火葬，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石人沟古墓群、十八道沟古墓群、林胜古墓群所采取的埋葬方式都是火葬。即将尸体火化后，盛入石函中。尽管石函的形制不尽一致，但均模拟房屋造型，函盖仿屋顶，函座拟房屋四壁。石人沟古墓群中还发现在墓葬前面排列石柱，以及石人、石狮、石羊等石象生。这种现象，吉林省东部地区尚未发现。

背阴位子山城、帽儿山山城、西北岔山城修建在江河边陡峭的山上，依山势而筑，无统一格式。山城规模都比较小，不适于民众居住，属于军事防御设施。

“副统之印”，边款刻有“大同十年七月”。这是一颗东夏国铜印。它的发现，标示着东夏国的势力所在，柳树河金代遗址或许为东夏国所沿用。

元代时，敦化隶属于斡多里万户府。

明代时，为加强对东北领土的治理，设置了辽东都指挥使

司和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下设许多卫所，其中兀也五卫即在敦化的额穆。1976年于大赉柴河镇征集了一枚明代的五子登科铜钱。

明代末期，兴起于东北的满洲民族，日渐强大，控制了东北的大部分领土，这时的敦化属于窝集部的赫什赫路。

敦化在清初为鄂朵哩城（即敖东城）地方，属额穆赫索罗（今额穆）佐领管辖。传说清始祖受新觉罗·布席里继顺，曾为鄂朵哩贝勒居于此城，所以清代文献称敦化为清室发祥之地。《皇朝通考》记载：“我朝，发祥于长白山。远祖平三姓之乱居俄漠惠（今额穆）之野鄂多哩城。今宁古塔西南三百余里，国号满洲，始开垦业”。《发祥纪略》记载：“始祖居长白山东鄂漠惠（今额穆）之野多哩城，兴京东一千五百里，宁古塔西南三百三十里，勒富善河西岸”。

从公元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起，敦化一带封禁二百多年，成为同朝廷进贡的捕鱼狩猎场所。到公元1878年（清光绪四年），吉林将军在此设垦局放荒，移民渐多。公元1880年（清光绪六年）经吉林将军奏请朝廷，在敖东城西二里处，起建新城。公元1882年（清光绪八年）委派了知事，正式设治立县。因敖东城也叫阿克敦城，附会“阿克敦”的“敦”字，取《中庸》一书“大德敦化”语句中的“敦化”一词，寄“敦风化俗”之意，而命县名为敦化，为吉林府所辖。

境内两条交通要道中的诸多驿站、哈尔巴岭上发现的依克唐阿碑，以及和福其等，都表明敦化在清代的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公元1910年（清宣统二年），将敦化县北部划出，新设额穆县（即额穆赫索罗）。

公元1914年（民国三年），敦化县隶属于延吉道。公元1929年（民国十八年），又直辖于吉林省。

1930年，延边人民的反日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继“红五月斗争”后，于7月30日到8月1日，敦化附近数百名群众，在中共吉敦临时党部领导下组成铁路破坏工作队，举行起义，破坏了吉敦铁路，砍断沿线电话线柱，烧毁敦化县新开通保卫团第一、二分队驻防所，袭击南黄泥河公安二分局。南黄泥河人民群众蜂拥而起，手持“唤起工农”的红旗，游行示威。同日，七十余名革命群众袭击马号，夺取驻地保卫团武装，官地的群众烧毁地主富豪的房屋，与当地警察展开搏斗，并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9月23日，日本关东军进驻敦化城。原在明月沟（现属安图县）的东北军驻军“老二营”，在被迫去黑龙江省镇压马占山部队的途中，于敦化江东的永烧锅举起抗日义旗，不久成立抗日救国军，为吉东地区抗日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同年秋，额穆县治迁往蛟河镇，仍称额穆县。翌年，在额穆设置岭东办事处，为伪县公署派出机构，管理张广才岭以东地方事务。在抗日战争年代里，敦化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2年2月，抗日救国军攻克敦化、额穆、蛟河三个县城；1935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一部和反日义勇军联合在哈尔巴岭颠覆日伪202国际列车，打死打伤护车日军30多人，俘获日伪军政官员13名，缴获大量物质和伪币；同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一部在额穆一带，与

崇世荣率领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会师，在官地、额穆一带与日伪军进行英勇战斗，连续攻占了官地、通沟岗子、额穆、黑石屯、靠山屯、青沟子等敌人据点，歼敌共四百余人，并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0月，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在青沟子乡六号屯与日伪军遭遇，击毙敌人多人，缴获轻机枪等武器十余件；12月，第二军一团巧袭敦化镇郊腰苇子沟（今腰屯村）董姓汉奸地主宅院，缴获三十多支枪和粮食等军事物品；1936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一师，在寒葱岭北坡山顶上伏击日伪军500余人及200余人警察大队，消灭日伪军警200余人，缴获许多轻重武器；1938年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在陈翰章将军率领下，袭击额穆，消灭很多敌人；1939年4月，抗联第二军第四师与第一路军总部警卫旅一部攻打大蒲柴河日军助川联队，击毙助川中佐，缴获机枪一挺和大批军需物资；6月，第四师一部和第五师在牛心山诱引伪敦化县警务科首席指导官等四名日军官上钩，当场处决了他们，并巧夺了大批军需物资；同年8月13日（阴历），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在魏拯民和陈翰章率领下，在大蒲柴河附近寒葱岭伏击日军松岛讨伐队乘坐的汽车，击毙松岛少将司令以下百余人，缴获一批轻重武器、弹药和粮食；1939年11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一部在陈翰章指挥下，袭击额穆伪警察署，消灭很多敌人。遂后在青沟子乡小青顶子消灭追随之来的敌人十余名；12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在马号乡六棵松、夹信子袭击敌人伐木场，缴获200多支枪和大量军需物资。1940年东北抗联根据斗争需要都转移到中苏边境地区进行野营训练。为迎接抗日大反攻，抗联领导派十几个小部队到东北各地进行活动，敦化发现的电报箱就是当时抗联小部队活动的历史见证。

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敦化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于1945年8月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艰苦而漫长的年代里，敦化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出现了很多象陈翰章那样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吉东分省专署成立，敦化、额穆两县隶属吉东专署。同年5月，吉东分省划分为延边、吉东（不久改为吉敦）两个专署，敦化、额穆两县隶属吉东专署，吉东专署设在敦化。

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二旅来敦进行了剿匪斗争。在剿匪斗争中，出现了吴恒夫、江贤如等英雄人物。1946年7月10日，中共吉林省委在敦化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巩固的东满根据地。会后，敦化县以及全延边境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6年6月，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敦化县各族人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解放东北和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7年2月20日，根据吉林省政府的决定，将延边专区和吉敦专区合并为吉东专区，专署设在敦化，1948年3月，将吉东专区改为延边专区，敦化县为省直辖县，并将额穆县并入敦化县，取消额穆县建制。1958年11月，敦化县由省直辖县划归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辖县。198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敦化县改为敦化市。

二旅开辟敦化情况的回忆

朱 国 栋

一九四六年二月，吉东警备二旅奉命赴敦化县剿匪，开辟地方工作，建立根据地。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二旅胜利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其功绩不可磨灭，永垂革命史册。

二旅赴敦前情况简述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军战胜日本侵略军后，由冀南军区的二十一团和太行军区的二军分区抽调的一个排以上干部架子团，相继到达东北辽宁省鞍山市。十月中旬，干部架子团在新民县大民屯同崔希凤（原系冀察晋军区八路军连长，被日寇俘到鞍山挖矿）同志领导的矿工队伍（三个团，这三个团是崔希凤同志在日本投降后组建起来的），合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旅。由邓克明同志任旅长，崔希凤同志任副旅长（因病未到任），张国震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陈福章同志任参谋长。

部队整编后奉命调到黑山、大虎山一带整训待命。不久，东总指示旅部率两个团护送从延安到东北的干部团，经法库、铁岭、清源、辽源等地到达东北局临时驻地海龙县，完成任务后，部队开到朝阳镇休整待命。随即东北总政治部将干部团的袁克服同志派到二十五旅任旅政委，陈发洪同志任旅政治部主任，原政治部代理主任张国震同志改任副主任，吴恒夫同志任旅参谋长，同时还派去七、八名团营干部分别任司、政、后部门的科、股长，我就是那次到政治部任组织科长的。

部队在该地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中签订的“双十

协定”，当时东满军区领导同志向干部讲话说：要准备用和平、战争两种方法同蒋介石争夺东北。就在那个时候，二十五旅在朝阳镇改番号为东北民主联军吉林省警备第二旅，下辖两个团，即四团、五团，共计三千余人。并决定开到吉东地区的敦化、蛟河、安图等县剿匪，开辟地方工作，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部队在朝阳镇同当地老百姓一起欢度了一九四六年的春节，很多住户老乡请部队指战员在他们家吃年夜饭，部队各单位也分别召开了春节军民联欢茶话会，不少单位还演出了文艺节目，喜气洋洋地欢度新春佳节，军民关系非常亲密。

正月初三，旅首长根据东满军区领导的指示，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作了东进动员报告。在分析吉东地区形势时旅首长说：“苏联红军占驻了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广大的乡村、集镇被上万名土匪（当时上边通报说整个吉东包括延边地区有三万多名土匪，敦化有近万名土匪）盘踞着。他们大肆骚扰抢劫，社会秩序混乱。我们部队到那里的首要任务就是剿匪，安定社会秩序，同时开展地方工作。”经过上下动员后，指战员的情绪高涨，信心百倍，整装待发，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各部门都加紧进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旅政治部着重研究和布置了行军路上的政治工作及到达吉东地区后如何开展群众工作问题。张国震主任以司令部、政治部名义亲自拟写了《告吉东人民书》的布告，经过反复修改，带到桦甸县印刷厂印了数千份，分发到部队，准备带到吉东地区张贴散发。布告阐明了我党我军的性质和任务，列举了日本法西斯统治东北人民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配合我军消灭土匪，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等等。二旅进到敦化后，这个布告确

实起了很大作用。

从桦甸到敦化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凌晨，天色蒙蒙，朔风怒吼，部队在冰天雪地里集合出发，四团前位，旅直属队本位，五团后位。因四团政委张贤廷同志患病离队休养，旅首长让我跟四团行动，帮助工作。经两天行军，于二月十七日下午到达桦甸县城宿营。东满军区后勤部驻在该县城，他们向我们介绍说，往东过了桦甸林子后，要翻越长白山脉末段的新开岭才能到敦化县，中间三百多华里没有人烟，而且雪深路险，很难行走。旅首长决定部队在桦甸休息三天，进行轻装和准备干粮。随即司令部通知四、五两团各留两挺重机枪和一门迫击炮，其余的重机枪和火炮以及驮枪炮的骡马和笨重的行装、病人等都精减下来，移交军区后勤部。旅首长担心部队舍不得轻装，还特别动员说吉东地区有很多枪炮，到那里再补充。后勤部派人动员住在县城里的朝鲜族老乡帮助炒大米，磨成大米面炒面，给每一个指战员发一口袋做干粮。二月二十日，部队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继续按原先的队列秩序出发东进。路经横道河、桦树林镇后，于二十二日下午抵达长白山脚羊角沟宿营。该地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庄，全团指战员都住在村庄外面一条沟里，以班排为单位各选择一块地方踩平积雪，就地拾柴烧起篝火，大家围着火堆背靠着背宿了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到深夜身后一阵阵冷风吹来，人人瑟瑟发抖。只听到人们低声叫着“冷啊、冷啊”，由于白天行军的劳累，到了深夜都顾不得寒冷便昏昏沉沉地入睡了。有病、体弱的同志被动员到几户老乡腾出的房子里休息。炊事班的同志铲除三四尺深的积雪，架

起行军锅烧化雪水做饭吃。凌晨一点多钟，团部集合号响起，部队立即集合出发。崎岖的山路已被大雪覆盖，西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我们整个一上午都跋涉在茫茫林海中的雪道上。中午时通过白雪皑皑的新开岭。指战员们饥渴了就吞炒面咽冰雪，政治工作干部总是跑前跑后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帮助有病和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团、营干部都把马让给有病的指战员骑，大家都讲团结友爱，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情绪饱满地走过艰难的路程，胜利地进到敦化县境内。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团到达敦化境内西面的三台山附近。

敦化匪情概况

敦化县的情况比军区通报的还要差，土匪极为猖獗，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当时苏联红军一个旅的部队分布在延吉到吉林的铁路沿线，其旅部率一个团驻敦化县城。我们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县城里有个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杨尚奎同志是刚从延安来的，只有危秀英等几名干部，尚未站住脚，还要靠苏联红军保护，半公开地开展工作。杨尚奎同志不能公开露面，主要由危秀英同志女扮男装出来活动。县长刘化一是苏军同地方协商指派的，他欺骗苏军，勾通国民党土匪，反对共产党及解放军。当时敦化只有我们党领导的朝鲜族独立大队，约四百多人枪，大队长兼政委名叫郑克（朝鲜族，后任二旅组织科副科长）。他们处境很困难，苏军不准他们进敦化县城，只能在县城西南郊朝鲜族居住较集中的地区活动，经常遭到土匪袭击围攻，粮弹补充困难。敦化县简直成了土匪作恶的天地。土匪头子名气比较大的有唐玉、张永春、张震湖、刘振民、周海林、于青山、吴惠等。国民党就趁着这个混乱形势大肆封官许愿，